



從四川省成都市中心天府廣場向東行駛30多公里，就是「中國西部客家第一鎮」洛帶古鎮。古鎮上，內地首家展現古籍文獻修復技藝的博物館——洛帶·藝匠古籍文獻修復博物館彷彿隔開了兩個世界：外面是熙熙攘攘的遊客、熱鬧喧囂的小店，裡面則是一絲不苟、埋頭修復的匠人，好似時光在這裡都放慢了腳步。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博物館展示了各種類型的破損古籍。



彭德泉為年輕修復師做示範。

修書匠彭德泉：為古籍文獻縫傷痕 於快慢之間補時光

# 用心復活古書生命

彭德泉正在修復古籍文獻。

74歲的彭德泉是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的名譽主任、創始人之一，也是洛帶·藝匠古籍文獻修復博物館的創辦人。從2005年開始，「修書匠」彭德泉帶着一批古籍修復師，一邊拚命與時間「賽跑」，秉持「能搶一本是一本」的信念，用心延續古書的生命，一邊又放慢腳步，細緻耐心地「望聞問切」，用巧手讓薄如蟬翼、破如篩網的古籍文獻復活。就在這樣的動與靜、快與慢之間，彭德泉和團隊一起「修補」着往日時光，讓千年歷史重現眼前。

## 修復古籍 從零開始

古籍主要是指編撰或印於1912年以前，具有文物價值、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的文獻典籍，年代越久遠，內容越珍貴。「紙壽千年，絹壽八百」，歷史變遷、戰亂動盪、天災人禍以及流傳過程中的不當保存，都會讓這些承載着厚重歷史的古籍文獻變得十分脆弱。彭德泉和團隊所做的工作，就是用精細的修復，讓這些受損古籍盡可能恢復。

「我從讀書到去劇團《唱書》，從教書到去圖書館『管書』，退休了又來『修書』，一輩子都在跟書打交道。」正是因為對書的情懷，當中國著名圖書館學家、目錄學家張德芳着急地對他說「小彭，你不要守在圖書館了，趕快出來搶救古籍」時，彭德泉很快辦好離崗待退，2005年開始和幾個老朋友籌劃瀕危古籍搶救性保護修復。

「我請來四川省圖書館退休的古籍修復專家劉英，開辦古籍修復培訓班，首批留下來的5名學員成了原始班底。」彭德泉說，時任廣漢市圖書館館長秦一是與他一起籌劃古籍保護修復的老圖書館人之一，大家就從廣漢市圖書館的古籍開始修復。「我們用了兩個月，才把兩萬多冊古籍整理完，除塵、登記、分類、上架，然後進行修復。」

「當時全家人都反對。」彭德泉笑稱自己從事古籍保護工作是一切從零開始。

## 屢遇貴人 越來越好

開始從事古籍保護修復工作後，彭德泉變得有點愛哭，而且逢人就願意講他遇到的貴人。

「2005年在廣漢建基地，秦一騰了會議室給我們，每個月還爭取到8,000元修復經費。2012年退休後來到中心，後來癌症復發轉移，2018年去世前一個月都還在鄉下考察古籍……」彭德泉說起昔日好朋友、老搭檔，不禁紅了眼眶。「她想做的，我一定會堅持下去。」

彭德泉的書友、律師馮家輝是他經常提起的另一個貴人。「初期最困難時連300元工資都發不出來，他二話不說，掏錢把每位員工的拖欠工資補足。」更讓彭德泉感動的是，登記註冊機構時需要10萬元資金，馮家輝直接把錢送到了辦證大廳。

2009年，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獲批登記註冊。彭德泉還記得第一次去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常務副主任張自清匯報的情形。「說到300元工資發不出來、員工冬天凍腫凍傷手卻沒人請假時，我哭了。張主任說，『你放心，我們會盡所有力量來支持你，幫助你。』」此後，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每次舉辦培訓班，不管名額多緊張，都會給彭德泉留一個。

彭德泉不會忘記的還有時任成都市博物館館長、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毅。「他頂着壓力安排了場地和啟動資金，讓我們從廣漢遷到成都。」

「員工領不到工資時還來安慰我，說相信以後會越來越好。」彭德泉掰着手指給記者數起了隊伍：從2005年一直幹到現在的潘艷、10年潛心歷練成為「成都工匠」的魯萌、不願回家接生意的施英濤、自食其力的聾啞修復師陳亞……「我虧欠這些娃娃太多了。」

在彭德泉看來，正是這些貴人相助，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才能成為古籍文獻修復的「民間主力軍」。據統計，從2008年至2018年，修復中心已累計為國內外120多個古籍館藏單位及民間收藏家修復善本古籍、拓片、字畫、檔案、紅色文獻等1.7萬餘冊（件），整理普查古籍17萬餘冊（件），成為內地規模最大的紙質文獻修復團隊，也是同期搶救修復古籍最多的團隊。



洛帶·藝匠古籍文獻修復博物館是內地首家展現古籍文獻修復技藝的博物館。

## 三個願望 塑複合型團隊

古籍修復是慢工出細活的細緻工作，與快不起來的修復速度相對應的，則是等待修復的古籍數量龐大。根據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的統計，從2007年啟動「中華古籍保護計劃」以來，各省級古籍保護中心上報的公藏單位古籍量已經超過5,000萬冊，其中有一半以上需要修復。

而古籍修復師的培養卻不容易。「不管什麼學歷和工作經歷，先進行9個月封閉式培訓，從調漿糊、搓紙捻、練訂紙學起。比如剪紙，必須練成沒有參照物、一刀剪成直線的技能。」彭德泉說，一名修復師從開始學習到能獨立操作，至少需要5年時間的歷練，修復中心從成立到現在，先後招聘過200多位修復師，最後只留下30多人。

「有些古籍文獻當時可能只是有蟲蛀，但如果不修復，過幾年可能再想搶救都辦不開了。」這樣緊迫的現狀，讓彭德泉就像個陀螺一樣停不下來，甚至2014年的第二次腦梗，都只讓他休息了不到20天。

正是因為他的堅持，家人由不支持變為支持，兒子彭克甚至放棄體制內「金飯碗」，全身心投入到修復中心。

如今，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形成了一支複合型古籍文獻修復團隊，能修復古籍、字畫、碑帖、錢幣、郵票、西文文獻等多種

品類。「如果這些人才流失了，好可惜啊！」在彭德泉心裡，這支隊伍就是古籍文獻修復事業的「種子」，是「燎原的星火」。

與時間賽跑的彭德泉，目前有三個願望：一是能有政府的扶持和社會各界的支持，給員工漲漲工資，讓他們全心修復；二是盡快將修復團隊發展到50人以上，每年修復5,000冊（件）以上；三是有更開闊的場地，充分發揮研學和社會教育功能，讓更多人了解、關注、支持古籍保護修復。



古籍文獻修復是一個慢工出細活的細緻工作，修復師需要耐得住寂寞、靜下心來。

## 望聞問切 修復唐代古籍

古籍修復師就如同給古書看病的「醫生」，受損嚴重的珍貴古籍經過他們之手，得以延續生命甚至「起死回生」。

「南北地域、氣候不同，古籍破損的原因也不一樣，主要有蟲蛀、霉斑、酸化、絮化、老化、鼠嚙、斷線、缺損等類型，修復方式和修復技藝也有所不同。」彭德泉說，修復中心對南北派的修復技藝進行了融合。

修復中心完成的古籍文獻中，修復難度最大、歷時最久、價值最高的紙質文物當數唐開元九年（722年）敦煌遺書·寫經。「這件古籍送到修復中心時，捲起來裝在塑料袋裡，已大量黏連、糟朽、碳化，部分散落成紙渣。」彭德泉邊說邊比劃，「碎成幾千片，最小的甚至比麥粒還要小，只要有點墨跡的都要編號。」

修復古籍同樣講究「望聞問切」，要先給古籍做「體檢」，檢測確定破損的部位、類型、幅度以及古籍紙張的酸鹼度、厚度、微生物侵害程度等，然後以圖文並茂的形式記載在「病歷」——修復方案裡，包括書卷名稱、破損情況、修復計劃等。

給古籍「對症治療」並不容易，僅是拆解書頁就不容易。「唐代的紙跟現在的不一樣，光是展平這件敦煌遺書·寫經，就花了接近1個月，有時一天只能展開1、2厘米。」彭德泉說，由於保存時的卷摺，

這件古籍的紙已變形呈波浪形，好多文字已經不在原先的位置，5人攻關小組在網上找來資料，一個個字地核對，還要計算每一行的字數。

「將碎渣全部拼接、拼接好又黏到頁面，再重新取下拼接在經卷上，這個過程花了6個多月時間。」彭德泉說，因為碎片太小，修復師只能用尖頭錐子一點點放在很薄的皮紙上，甚至呼吸稍微用力一點，都有可能把紙屑吹飛。「古籍修復講究修舊如舊，不補字、不描欄、不求全，保留其原有時代風格。現在我們不可能再找到唐代的紙，只能找顏色、簾紋、厚薄、質地盡量相近的紙，需要用放大鏡仔細觀察紙的纖維能不能撐得住，濕度、力度的把握都很重要。」

有時實在找不到厚度相同的紙張，修復師會用竹子削成的起子從紙張的一角開始一點點剝離，將一張薄如蟬翼的紙剪成兩張使用。在專業測厚儀的測量下，劈開後其中一張甚至只有0.06毫米。

「雖然我們是民營修復機構，但除滿足書平、口正、欄齊、線直等修復標準外，修復的每一件古籍文獻都有專家把關，實行『一票否決』。」彭德泉說，古籍「出院」前，修復中心會準備好修復日誌、結項報告、專家鑒定意見以及記錄修復過程的微電影，將這份古籍和修復歷史完整地留給下一代。



敦煌遺書·寫經是修復中心完成修復難度最大、歷時最久、價值最高的紙質文物。圖為修復前的敦煌遺書·寫經。

## 建博物館 留住修復技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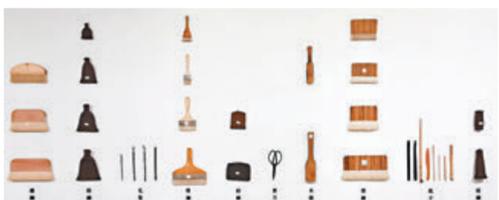
2016年3月底，國家級古籍修復技藝傳習中心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傳習所正式掛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古籍修復技藝代表性傳承人杜偉生任導師，成為內地首家經國

家古籍保護中心批准設立在民營修復機構的傳習所。

「古籍修復是手藝活，現在雖然會使用一些科學儀器，但修復過程主要還是靠人。」彭德泉說，這10餘年來，他越發感到，和修復古籍同等緊急的，是修復技藝的傳承。

「比如杜偉生老師執筆訂了國家標準《古籍修復技術規範與質量標準》；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領銜專家、碑刻拓拓及碑帖修復大師趙嘉福積累幾十年的技藝。」於是，2017年開始，建博物館的想法在彭德泉心中扎了根。

經過2年多努力，2019年底，以收藏紙質文獻修復技藝為方向的洛帶·藝匠古籍文獻修復博物館正式揭牌。博物館佔地1,100平方米，包括綜合展示廳、核心展陳區、傳拓體驗區、修復體驗區等區域，面向公眾普及古籍修復知識。



修復古籍文獻的常用工具。